

历史藏于细节,行路抵达山河。本期读书版带来“百本好书送你读”推荐书目中的3篇书评,分别钩沉古卷里的温情烟火、感受抗战时期文脉传承、探访中东地区的鲜活日常。愿这3本好书,陪你开启别样的纸上旅程。

——编者

以小见大,触摸历史的肌理

——评马伯庸《历史中的大与小》

■周睿智

马伯庸向来以“考据型历史小说”为人熟知。从《长安十二时辰》到《长安的荔枝》,再到《显微镜下的大明》,他始终擅长在历史的不显眼处挖掘被遗忘的细节,用细腻的笔触还原历史的烟火气。我在北京见过马伯庸先生本人,初识显得文气而寡言,但说话用词精准,颇有见地,能够从许多细节聊起,逐步引申到更大的话题。这和我从他作品中获得的印象颇为相近。

时常读史的人,眼光往往能够穿透表面,看到更深层的内在运行方式。当我们谈论历史,脑海中浮现的常常是帝王将相的权谋博弈、王朝更迭的波澜壮阔,是《史记》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叙事,是论著里泾渭分明的时代分期与历史定论。我们习惯了站在高处,俯瞰历史的长河。而马伯庸的《历史中的大与小》,正是一本打破这种固有认知的杂文集。

本书体量不大,和他的那些大名鼎鼎的畅销小说作品比起来,算是其创作史中的“小作”。但仔细分析却可以发现,这本书是他创作风格的延伸与沉淀——这不是一本体系化的史论著作,也不是一本情节跌宕的小说,而是一本“散装”的杂文集,

收录了他10年间零零散散写下的文字,包括最后的一部文学剧本。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我没那么热爱工作,只是单纯好奇罢了。”这份不加修饰的好奇心,让马伯庸跳出了学术的桎梏,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带着我们去触摸历史中那些可感可触的细节,去倾听那些被正史忽略的声音。

这本书的最大魅力,在于它跳出了宏大叙事的框架,以“微观考古”的笔触打捞被遗忘的小人物与小事件。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小人物往往只是宏大历史的背景板,是帝王将相功业簿上的注脚,他们的喜怒哀乐、生存挣扎,都被淹没在王朝更迭的洪流之中。但马伯庸却认为:所谓大时代,不过是无数小人物命运的叠加,历史的真正重量,从来不在庙堂高论里,而在尘埃里的每一个小人物、每一件小事中。

于是,我们在书中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作家没有刻意拔高这些人物的形象,也不赋予他们宏大的意义,而是以共情的视角,还原他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他写古人牙疼的窘迫,从《齐民要术》《千金方》等史料中梳理古人应对牙疼的方法,既有帝王将相的奢华疗法,也有平民百姓的土法偏方,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感受到古人与我们相同的生理困扰与生

活烦恼;他写蒲松龄的“高考作文”,以现代阅卷老师的视角,批改蒲松龄的科举范文,分析清代科举的评分逻辑,让我们看到这位文学巨匠在科举路上的挣扎与无奈,也读懂了封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束缚;他陪孩子读古文名篇,将《木兰辞》当作分镜脚本,品味其镜头语言与留白艺术,将《出师表》解读为职场智慧,让枯燥的古文变得生动有趣,也让我们看到历史与当下的奇妙联结。

除了小人物,马伯庸还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中的“小物件”“小事件”,以小见大。一块刻有“晋平吴天下太平”的铭文砖,看似简单的几个字,却承载着西晋统一全国的历史记忆,也藏着乱世百姓对太平盛世的热切期盼;一条18公里的朱家山河,耗时410年才修完,背后是明清官场的效率变迁,是权力博弈的微妙细节;甚至天宝年间的一场念奴小事件,也能折射出唐朝由盛转衰的隐忧。作家就像一位细心的侦探,从这些微小的线索入手,一步步推演、想象、构建出合理的历史图景。

考据扎实、笔法灵动,是这本书的另一大特色。马伯庸的作品向来以考据严谨著称,这本随笔集也不例外。每一个切入点都有史料支撑,小到唐代外卖、古人

牙疼的治疗方法,大到万历援朝的无名医者、敦煌归义军的历史,他都在文献与实物中寻根溯源,不戏说、不臆断,确保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但他又没有陷入学术的晦涩与枯燥,而是以幽默通俗的语言,将考据过程写得像探案小说,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感受智识的乐趣。

《历史中的大与小》远不止是一本趣味历史读物,更藏着一套认知历史的方法论。当下,我们常常陷入“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困境,忽略了历史的细节与温度,将历史抽象为一条条冰冷的结论。而作家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历史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功业,而是无数无名者的悲欢叠加;最鲜活的真相,藏在正史忽略的边角料里。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少有时间去研读厚重的史书,却可以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翻开这本《历史中的大与小》,随着作家的脚步,带着好奇心,去触摸历史的温度。这或许也正是《历史中的大与小》的魅力所在——在细节中读历史,在微末处见乾坤。

师者万里行,文脉烽火传

——《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读后

李政道的求学身影,也写下了竺可桢10天内痛失妻子和孩子的悲楚。他描绘了武汉大学教师们的生活窘况,他们“赁屋而居,大风刮掉了屋顶的瓦,每逢下雨,家里人就忙着用各种容器接漏”;也记录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大光在战火中求学的经历——尽管身处乱世,“武汉大学的教学要求却未曾有一丝放松”,甚至施行双语教学,这为俞大光一生的科研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还写到复旦大学敞开校门收容东北流亡学子,不仅提供食宿保障,更培育出大批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与此同时,也记录了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在北碚竭力资助端木蕻良与萧红渡过生计难关并助其远赴香港,而他自己却放弃留港机会,毅然回到复旦学子身边的坚守。他再现了西北联大师生的日常:每日步行至少十几公里,“每天一出发,大队便唱起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每天不知道要唱几遍”。

在最作平笔下,抗战中的师者不再是不苟言笑的教师,而是在饥饿、疾病、轰炸与流离中坚持办学和保护青年学子的师长,他们有的失去了妻儿,有的疾病缠身,有的埋骨异乡,却始终“以倔强的身影,抗

着的声音,孤勇的命运”抵抗侵略,在穷乡僻壤间维系中国大学的文脉。

在AI浪潮席卷、史料数据丰富的当下,作者依然选择走进历史场景,去感受历史的遗存。他特意选择走秦岭的老路,因为“这条路,是80多年前那1000多名师生用双脚丈量过的”;他“穿过横岗岭,沿着曲折的街巷,向着卧龙山方向寻找了足足半小时,终于在一条破败的小巷里找到了那座小庙——仓颉庙”,那里曾是厦大校长萨本栋主动放弃舒适的长汀饭店后的住所。历时数年,他沿着战时高校内迁之路一步步“重走”。这种“重走”本身便是一种可贵的写作方式:它拒绝书斋式的想象,而是以身体的在场去触摸历史的温度,以行走的艰辛去体会大学内迁的沉重和使命。

在回溯历史之外,最作平还收获了内迁之路给中国社会留下的“反哺”印记。浙江大学为涪潭这座闭塞落后的山城吹来了现代文明的新风,使当地社会思想为之一新。华中大学在喜洲的8年间,使这座重商轻文的小镇转变了观念,开始重视教育。其间,华中大学不仅建成了两所完全小学,还培养出300多名云南籍毕业

生,他们后来成为云南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中坚力量。此外,华中大学还教会喜洲农民种植引进的花菜和西红柿。西北联大对五门堰水利工程测绘、修缮和保护,为该工程日后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打下了基础。厦门大学迁驻长汀后,协助创办了长汀县立中学,并安排厦大毕业生到校授课,极大提升了当地教育的普及程度。在原本现代文化不易传播之地,内迁大学在烽火中播撒了现代文化、科技和教育的养分,在漫长的岁月中持续滋养着山河万里。

抗战时期大学的内迁之路,象征着无论在多么黑暗的长夜,总有人试图以一炬微光烛照人生、烛照世界。抗战时期的大学老师们将民族的抗争与兴亡系于一身,无问西东,更无畏生死。《山河万里》既是一部记录抗战时期大学内迁的精诚之作,也是一曲献给抗战时期师者们的悼章与浩歌。它用历史和重走告诉我们,在民族危难的岁月里,曾有一群人以脚步丈量山河万里,以生命守护文化薪火相传。他们的身影虽已远去,但他们依然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姿态与担当。

跨越山水,与陌生生命的真诚相遇

——读《看不见的中东》有感

■王承军

我第一次注意到《看不见的中东》一书的作者姚璐,是在2023年7月,当时有媒体报道了她成功登顶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的消息。

作为一名女性,攀登高海拔雪山、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不仅需要克服比男性登山者更多的身体挑战,也要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当她宣布新书《看不见的中东》出版时,我就第一时间阅读了这部作品。在文字与影像之间,我得以从另一个视角,看到一个真实、立体且富有韧性的中东。

从2016年到2020年的4年间,姚璐没有团队、没有保镖,甚至没有购买旅行保险。她克服了签证互斥、路途险阻等诸多困难,突破传统探险式旅行的框架,摒弃“旁观者”的视角,以“沙发客”的身份5次深入中东地区。她几乎走遍了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以色列、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主要国家,深度融入31个当地家庭,与居民同吃同住,交流对话,探访这片古老土地上普通人的温暖与辛酸,用脚步和镜头记录下长袍之下真

实的日常生活。可以说,她的旅程是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也是一次与异国他乡个体生命的真诚相遇。在伊朗,她跟着当地家庭学做藏红米饭;在叙利亚,她在少女的闺房中倾听她们的梦想与烦恼;在沙特,她悄然记录下女性首次获得驾驶权后的珍贵瞬间。那些被长袍包裹的身影,其实是一个个拥有爱恨、坚守与梦想的鲜活个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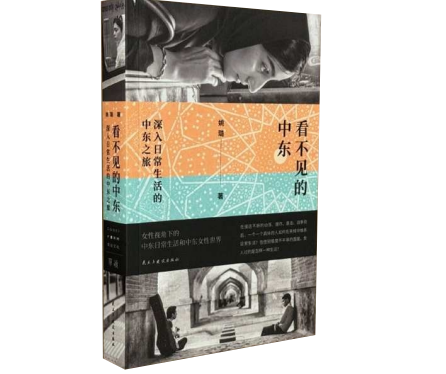
书中没有刻意渲染生活的苦难,而是平静地呈现她们的生存状态:有人在努力争取受教育权与工作权;有人在家庭与自我之间寻找平衡;有人在废墟中依然坚守着对美的追求。这种云淡风轻的记录,比振臂呐喊更有力量,也让我们读懂女性的坚韧与渴望,从来都不分地域与文化背景。

最令人动容的,是作者对艰难环境下普通人家烟火气的记录:孩子们光着脚,在残垣断壁的废墟上踢球时的欢声笑语;在伊拉克摩苏尔被摧毁的街区,民众重建家园的坚定身影;在叙利亚阿勒颇,一个刚经历轰炸的家庭,却拿出珍藏的最后一点糖为她做生日蛋糕;在沙特的沙漠里,贝都因人教她辨认星座和沙丘的走向。这些场

景,正如作者所说:即便生存再艰难,生活依然在顽强延续,人们照常结婚生子、庆祝节日、追逐梦想。这种在苦难中坚守的烟火气,正是人性最动人的一面。

当人类情感的复杂性让语言显得苍白时,一幅恰到好处图片往往胜过千言万语。作为摄影师,姚璐在书中展示了70余幅纪实照片和风光作品,它们和文字交相辉映:弹痕累累的大马士革机场、街上随风飘扬的床单、孩子天真灿烂的笑容、大漠升起炊烟,每张照片都充满了温度和力量,把文字中难以言说的情感定格为永恒的画面。这些画面不刻意追求视觉冲击力,却于细微处见真情,让我们触摸到了一个真实的中东:既有历史的厚重与伤痛,也有日常的琐碎与温暖。

平淡、温情、克制、包容,是这本书语言的突出特点。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过度的煽情,只有直抵心灵的力量。作者冷静、温和地审视着这片土地复杂而又丰富的一面:它们有冲突和撕裂,也有温暖和依恋;有古老和保守,也有新潮和渴望。这种客观与包容,成就了本书人文关怀与认知价值兼具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



《看不见的中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旅行随笔。

合上书,令人沉思。在这个满是标签化、碎片化信息的时代,叙利亚年轻人那句“我们已学会在爆炸中做饭”的淡然话语,夜幕下的伊朗青年为追求梦想而在桥洞弹吉他唱歌的画面,正是《看不见的中东》最生动呈现给读者的现场:看见中东寻常人家的烟火气,看见面纱后面的真性情,看见顽强的生命力。

中东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而是由无数个具体的人构成的世界,他们的日常,他们的坚韧,他们的梦想,与我们别无二致。作者用地的勇敢和真诚,架起了一座通往中东的桥梁,让我们得以跨越山水与民族,读懂这片古老土地的厚重与温婉,读懂人性相通的美好与坚持。



■南风子

美好的儿童文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氣息。翻开青年作家陈琰枫的长篇儿童小说《不可思议的面具》,扑面而来的是山间佛堂里杨木与香樟混合的微微清苦的木香——那是雉戏面具的气息,是武陵山深处飘来的古朴气息;也是城市男孩将塑料面具贴上脸颊时,屏住呼吸、等待魔法发生的紧张感——那是童年的气息,是一个孩子渴望成为“另一个人”的瞬间。两种气息交织,便有了这部小说独特的质地。

好的儿童文学,作者常常会“蹲下来”,把视线放到和孩子目光齐平的高度。你看李米米眼里的父亲:在外是笑容满面的“真爸爸”,回到家却成了“神情凝重,说话简短”的“仿生人”。他的故乡桃花源寨,有人说在仙境里,有人说只是想象,于是孩子最本真的疑惑来了:“老家要是在仙境里,那李爸爸难不成是从仙境逃出来的神仙呀?”这里没有大人的定论,只有孩子眼里的光。作者不评判,只呈现,他相信孩子的感受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被郑重对待的真实。

这本书里的故事长出了藤蔓,它攀爬的支架叫“游戏”。那个叫作“桃源戏幻”的世界,心里想什么就出现什么,故事坏坏了可以退回去重来——这不就是每个孩子无师自通的“过家家”么?作者的妙笔在于,他把土家族的傩公傩娘、二郎神都请进了这个“游戏场”,神话成了可以对话的伙伴。李米米来猎开猎神之弓射中莽汉,这飞出来的一箭,射中的不仅是恶霸,也射出了一个男孩对自己力量的初次确认。庄严的“赶仗”狩猎仪式变成了集体游戏,神圣与凡俗在游戏的框架里融合了起来。李米米三次进入同一段“命运”,从丧命到逃避再到战胜,这是一个孩子学习“勇气”“友谊”和“责任”时必须经历的跌倒与爬起。

读这本书时,我们的五官和心灵都会“苏醒”。作者的语言很有灵气,能让写下的东西都生出魂灵。“面具沉甸甸的,散发着一股令人舒适的香樟木气味”——你仿佛能闻到木头香;“太阳躲到了群山背后,天空只剩一片绯红”——你眼前立刻就是那个赌气跑上山坡的孩子的背影。他写桃源戏幻里的魔幻时刻:“夕阳在两壁高耸的峡谷之间发出柔和的橙色光辉……江涛波光粼粼,层林流光溢彩,两种光如同钢琴师与小提琴手,正在协奏一曲德彪西的《美丽黄昏》。”这分明是用文字的画笔调色。

故事最深的根,扎在“心灵成长”这片土壤之下。李米米心里的缺口,是妈妈在斑马线上留下的那个黄昏。故事给的慰藉不是填平它,而是教给孩子一种“月光般的辩证法”:妈妈说,想她的时候就看看月亮,“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于是那个缺口被一束温柔的光照亮了。这束光成了李米米情感世界的底色,所以当 he 看到聂郎母子相依为命时,心中涌起一种深刻的羡慕——“我可以天天见到母亲,不像你在天上那么远。”当他在月光中看见仙子装扮的妈妈,听见“孩子,别管我,你快走吧”时,那与重症监护室最后一别重叠的场景,让所有积压的泪水决堤。这不是廉价的幻想安慰,而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哀悼仪式。当李米米最终喊出“妈妈!我会勇敢往前走”时,他终于学会了带着这束光去走自己的夜路。

“面具”,大概是这本书最精巧的比喻了。谁没戴过面具呢?李米米在神圣的傩堂里戴上真正的二郎神面具,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原来别人给的标签,定义不了你是谁。面具既能帮你藏起真实的情绪,也能让你展露更理想的自己。他用“狡猾”面对父亲,是一种面具;他戴上傩面行侠仗义,是另一种面具。成长,就是在这戴一摘之间,慢慢辨认出镜子里那张独一无二脸。

这部奇幻冒险小说做了一件很美的事:它把土家族傩戏里“人可通神”的古老信仰,转译成了现代孩子“寻找自我”的内心寓言。李米米踏入“桃源戏幻”,经历三次冒险——从命丧龙口,到与挚友决裂,最终直面孽龙、智取龙珠、疏浚洪水。这是一条完整的英雄之旅,会让孩子一翻开就放不下。这种文化转译的成功,在于作者把握了“童心”与“土性”之间的共鸣。二郎神不再是《封神演义》里的既定形象,而是“治水的英雄”“猎神的化身”;龙宫不再是珊瑚贝阙,而是以聂家庄为蓝本的山野村落。文化在这里是活着的传统。正是这种根植于本土的奇幻建构,让小说有了双重呼吸:一层是冒险的酣畅,另一层是文化记忆的回响。而奇幻主线之下,暗涌着一条心灵成长的暗河。每一次冒险都是一次试炼:第一次是勇气尚浅的代价,第二次是逃避责任的阵痛,第三次他终于明白,真正的英雄不是戴上谁的面具,而是认领自己的名字。当李米米喊出“我叫李米米”时,奇幻冒险抵达终点,而成长的序章刚刚开启。

这本书是作者送给孩子们的一面会呼吸的镜子。它照见的,不仅是二郎神的传奇光影,更是每个孩子内心那片星辰与泥土交织的旷野——有泥泞的道路,也有爱意灌注的清溪;有无数个等待被戴上的“面具”,也最终,有一张等待被自己全然接纳的、真实而独特的脸庞。

月光下,每个合上这本书的孩子,都可以是自己的“二郎神”。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据《重庆日报》